

一群普通人调查 20 多年，为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存证

本报记者冯源

一只小小的跳蚤，图片放大后形容可怖。它的下方，附有六行日语——六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菌学名：鼠疫菌、霍乱菌、副伤寒菌、伤寒菌、痢疾菌、炭疽菌。毒虫和恶疾的背景，是砰然炸裂的火光。

在这张图片的左面，则是一份日本战报的一小段截图，里面有多个地名：广丰、玉山、常山、衢县、丽水……作战名称用日文“木”编号，战报中还有多个杀气腾腾的字眼：毒化、干燥菌、鼠-蚤-人间感染。

这两张图片刊载在一部抗战痛史的封面上。这部痛史就是 41 万多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这是浙江丽水一群普通人走遍市井乡野，持续调查 20 多年的成果。

他们中有退休老干部，高校党校的教师，档案部门、卫生部门和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村民。

恶疫来袭

浙江丽水，古称处州，建于隋代，2000 年撤地建市，其市域面积占浙江全省陆域约六分之一。武夷山自福建向东北延伸，进入浙江，化作了仙霞岭、洞宫山、括苍山的层峦叠嶂。山间溪水奔流，汇成了浙江的第二大河流瓯江，从而构成了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瓯江贯穿丽水全境，在下游的温州注入东海。

因为有适合坚守的地利，1937 年底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及附属机关迁至丽水地区，浙江的不少学校也纷纷迁入，像浙江大学就在其中的龙泉县设立了分校，直至抗战胜利。当时的丽水是全省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1939 年 4 月，周恩来就曾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丽水视察。

丽水还拥有一座军用机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空军基地。正因如此，依山傍水的水城成了日军攻击的目标。据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日军侵略浙江罪行史》记载，丽水是浙江全省遭遇日机轰炸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8 年间丽水各县共被炸 450 多次，其中的丽水县（今市区所在地）被炸 365 次。1942 年 6 月至 8 月，1944 年 8 月至 9 月，日军两次攻占丽水县县城。其间，日军烧杀淫掠，罪行罄竹难书。

丽水两次沦陷，均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有关。1942 年，日本本土遭到了美军杜立特航空队的空袭，因担心美军利用华东的多个机场再袭日本，日军发起了浙赣战役，进犯丽水



2013 年，庄启俭（左二）和同事访问细菌战受害者黄克让（左一）。受访者供图

是一次配合作战。1944 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败再败，导致日本本土与南洋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中断，为此，日军在豫湘桂战场发起了“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到中南半岛的大陆交通线，而进犯丽水、温州也是一次配合作战。

两次沦陷中，丽水不但经历了枪林弹雨，还流行了恶疫。日本关东军 731 部队、“华中派遣军”的“荣”字 1644 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在当地实施了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细菌战，鼠疫、炭疽、伤寒等恶疫肆虐横行。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封面上的那张战报图片，就来自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这部日志直到 1993 年才被日本学者发现。在第 9 卷，井本记下了 1940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参谋山本吉郎对细菌战的说明：“广泛使用稀释弹药和少次数散布浓度大的情况下，后者选定温州为目标（台州、温州、丽水）……”

而日军对丽水实施细菌战的时间还要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 1940 年，当地疫情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据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调查，从 1942 年至 1947 年，仅丽水县（现丽水市主城区莲都区）鼠疫伤亡人数就有 1926 人。而在丽水全市，细菌战的受害者至少有 1.5 万人。

家仇国恨

“我家里有 5 人感染鼠疫，祖母、姑母、伯

母、表兄和堂兄，只有我姑母被伯祖父治愈。”《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的主编、丽水市莲都区丽光村村民庄启俭告诉记者，“我小时候去上坟，父亲经常和我说起那段历史。”

1948 年初出生的庄启俭，是丽水中学 1966 年的高中毕业生，“文革”爆发后回乡务农，用他的话说就是“本来还有十来天就要高考了”。他的伯祖父庄虞卿曾考中秀才，曾长期在宁波、杭州、上海行医，并曾在上海的医科大学任教。

“1945 年春天，我堂兄庄启兴死于鼠疫。1946 年 8 月 29 日，奶奶庄戴氏在房间里纳鞋底，突然有只老鼠从脚边跑过，随后又发现自己大腿上被跳蚤叮了一个包，不久就高烧不退。伯公诊断是鼠疫，先给奶奶服用中药，又用血清针剂注射，但是第二天傍晚，奶奶还是去世了。我大姑母赶来探病，也被传染，还好幸运地被伯公医好了。”

“我家当时住在丽水城中心的太平坊，那里有个‘老人角’。20 世纪 80 年代，老人们在那里谈天说地，都会说起日本人如何凶恶，也会说当时流行的鼠疫是日本人搞的。所以我 1997 年在义乌经商的时候，听说当地成立了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就马上想到了丽水的情况。”

1997 年，庄启俭在街上遇到了在当地外事部门工作的初中同学徐军龙。徐军龙告诉他，将有一批日本友好人士前来调查日军细菌战史实，庄启俭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前期的史料调查工作。

“我记得第一站是去联城镇白前村。当地有位老人叫占炳亮，已经 84 岁了，曾经在当地的白善小学担任校长。1940 年秋天开学后不久，学校里暴发疫情，学校老师吕有同的两个儿子同时病倒，1 周后双双去世。去买第一口棺材的人还没有到店后，后面的人又赶上了，说还要再买一口……”

时至今日，庄启俭还记得那对苦命小兄弟的小小坟头，墓碑上还有“朝俊朝林（民国）廿九年秋立”的字样。“老占和我说，两兄弟的父亲没过多久就回老家缙水壶镇去了，后来也没有回来过。”

1997 年 12 月 25 日，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问题揭露会”一行 8 人来到丽水，庄启俭以受害者家属和调查者的身份参加了座谈，并提供了调查资料。同时，“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受害者协会”开始筹建。“看到日本友好人士提供的资料，我们才知道，原来日军曾两次对丽水实施过细菌战，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日本人那么凶恶。”

庄启俭说，老人们一听要讲日本人侵略的事情就面带惧色。他们会想到空袭警报和飞机轰炸，说当时都不知道能不能捡条命活下来。每每回忆，大家都会抚胸长叹：“吓死人、吓死人……”

铭记历史

从 1998 年 12 月中旬到次年 1 月上旬，“侵华日军 731 部队细菌战罪行”图片展轰动了丽水，不少村民还从乡间赶到城里观看。冬天天黑得早，大家在展板前你一言我一语，迟迟不散。

“1998 年，我们和义乌方面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联系上了，11 月份，我们去义乌参加悼念活动。我在会上提出，可以把海外送来的 731 部队细菌战罪行展板拿到丽水展览。”庄启俭回忆说。

“老庄做事很认真，也能做文字工作，所以 2000 年的时候，各地原告代表一致决定，特邀他担任原告团副秘书长。”当时的原告团团长、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战史研究分会会长王选回忆说，义乌和常德方面已经于 1997 年组成了原告团，丽水方面没能赶上诉讼，“我当时就和老庄说，希望他们能把丽水的相关史实搞清楚，把问题做实。”

1999 年，丽水的细菌战受害者和家属、丽水地区新四军研究会的老干部、地方志愿者组成了一个调查会，走遍了丽水城乡。从 2013 年 8 月起，丽水市档案局等多

个部门启动了为全市近 200 名细菌战幸存者口述建档的工作。2015 年，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

“当时的不少志愿者已经是老人了，但是不辞劳苦地去挨家挨户地调查。”庄启俭记得一连串的名字，当年，到富岭乡要找刘兰土；到碧湖镇可以联系汤益友；城关镇的抗战老兵严锦文老人年过百岁还惦记着调查工作；在抗战中亲历小水门鼠疫的退休教师胡雷祥老人，找齐了在旧城改造后各自搬迁的原住户……

“还有一些农村志愿者是受害者的后代，每次接到通知，他们都马上放下农活，来城里开会，路费都是自理的。他们通过各村的老年协会去调查，效果很好。”庄启俭说，当时的调查工作，多亏了这批土生土长的志愿者，本书编委中也有不少志愿者。王选也表示，最有价值的，就是书中的民间历史调查。

“我们的调查是非常扎实的。”庄启俭的书架上放满了历史书籍和调查资料，他抽出一册“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调查表汇编”；每一张调查表上，都贴有幸存者的照片，要填写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份证编号、住址、联系人，以及当时的传染情况、医治情况、后遗症，还有家庭成员、亲戚、邻居、其他人的同时传染情况，以及幸存者的签名和指模……“我们当时还给幸存者录像，就是希望他们健在时能够把亲身经历保留下来。”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的初稿完成于 2002 年，今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有 100 多篇亲历者、幸存者的口述历史纳入书中。庄启俭说，出版周期这么长，一方面是需要不断地丰富史料，有不少史料是他们在市外、省外甚至是日本搜集到的，另一方面也是在筹措经费。“后来王选牵线搭桥，联系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他们资助了一部分出版经费。”

“其实我们的调查工作背后，也有许多人在支持，不少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到丽水来和我们一起调查，还有不少大学生志愿者。大家都希望能把这段疼痛的历史记录下来，昭示后人。”《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的结尾细数了一遍从 1997 年至 2020 年的民间调查工作大事记，庄启俭说，这也是一段历史。

如今，庄启俭是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的会长。须发渐白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调查工作之中。

大学生姐弟回江心洲种菜 7 年，“这道选择题做对了”

本报记者陈尚营

这是一个普通又让人有些意外的故事。说普通，和很多回乡大学生的经历一样，姐姐余青青和弟弟余永斌都是大学毕业在城市工作了几年后，同时回到了他们从小生活的江心洲上。江心洲是长江里的小岛，四面环水，岛上和很多大山里的村庄一样，少见年轻人的身影。而他们的不一样，是记者和他们深入聊过之后察觉到的。要从城市回到各方面条件都很一般的村庄创业、生活，年轻的姐弟俩并没有按一般的“剧情”发展，他们没有思想上的激烈挣扎，和好不容易送他们到城市里立足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矛盾冲突。

读书、考大学、在城市工作、回家乡种菜，用姐弟俩的话说，虽然做的是选择题，但每一次选择都很自然，不纠结。

当大学生回农村创业不被另眼相看，不会让别人觉得这是“没出息”，乡村振兴就很有希望了。

忙得劲

初冬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姐弟俩和家人管理的金铜蔬菜基地。等在那里的余青青告诉记者，弟弟余永斌负责销售，下午通常不在，“我负责种菜，他负责卖菜”。金铜蔬菜基地在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铁铜江心洲上。这里以前叫铁铜乡，今年上半年枞阳县行政区划调整，铁铜乡撤销，并到相邻的枞阳镇——两个地方隔着一处长江里的夹江。从镇里到江心洲上，需要坐渡船。见到余永斌时已是第二天上午，他开着拉菜的货车回到基地。1988 年出生的姐姐和 1990 年出生的弟弟站在一起，虽然两人皮肤都有些黑，但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并不显老。余永斌的黑眼圈很重，问他是不是经常熬夜，他笑着回答：“我过的是老年人的生活，很少熬夜，晚上一般 8 点多就睡觉。”看出记者的惊



余青青和余永斌在大棚里摘辣椒。

本报记者陈尚营摄

讶，一旁的余青青解释说，弟弟凌晨两点多就要起床去铜陵市区送菜，不早睡起不来。

“每天都这样吗？”记者问。

“基本上是吧，两点多出发，小货车跑得慢，从市里回来差不多上午 10 点了，下午 1 点多再到基地装菜，送到邻市安庆的一个大型菜市场，下午 6 点多再回家，晚上必须要早睡。”余永斌说。

余青青会在晚上 10 点之前休息，早上四五点钟起床，“蔬菜要早点采摘，我早起要准备摘菜的各种工具、装菜的筐子等，工人来了就可以直接摘菜，节约时间。”余青青笑着说，辛苦是肯定的，“但忙得也有劲。”

半个土专家

余青青现在很忙。除了基地的事，她还要出去学习。

今年十一假期之后，她去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参加“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培训班；9 月份，她到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学习，那里是长三角知名蔬菜种植大县。

余青青说，去外地学习，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在小岗村，她认识了一位种植大户，跟她请教了很多除草的技术要领。在和县，她学到了一个防止辣椒倒伏的好法子，“我参观了人家那个大棚，辣椒树下面都拉着线，一排排很漂亮。我开始以为只是为了美观，后来才知道，还可以防倒伏。”曾为辣椒倒伏而烦恼的余青青说。

余青青大学专业是经济学，她笑言原来脑子里关于经济学的知识现在都被蔬菜学占领了。在稍显凌乱的办公室兼会议室里，摆放着各类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的专业书

籍。“已经干了 7 年，也算半个土专家了。”余青青说。

除了蔬菜种植方面的专业书籍，余青青看得最多的居然是大学课本。她至今留着大学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教材，有时间也会翻一翻。“现在看，和上学的时候看，感受真的不一样。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结合我每天接触的蔬菜供需结构变化、蔬菜价格波动，发现它里面很多理论，越看越有意思。”余青青说。

对大白菜、辣椒、茄子等各种常见蔬菜的特性，余青青如数家珍。“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就靠这几年，我爸带一带，自己看书，也请专家到基地来教。”余青青说。

在蔬菜基地的前 4 年，余青青每年都要花钱从外地请种菜师傅，有时候一来就是几个月。“基本上每年两位，4 年请了 8 位专家，一个师傅有一个师傅的特长，我一边学，一边从实践中再摸索。”余青青说，现在的金铜蔬菜基地是集众家之长。

和姐姐不同，余永斌对种菜并没有太多的研究。虽然农忙时也会帮着下地，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销售。

余永斌在武汉读大学，专业是机械工程。“现在开车算是一点专业对口。”余永斌笑着说。站在一旁的姐姐补充：“翻地时他还要开旋耕机，很在行。”

有态度的年轻人

毕业后，余青青在广东从事教育培训工作，余永斌在安徽合肥的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两个人 2014 年 10 月决定回乡种菜时，都已在各自的城市站稳了脚跟，有了不错的收入。

“我爸以前做点蔬菜生意，后来觉得还是回老家自己种划算，就回来包地搞蔬菜种植。”余青青说，2014 年国庆节前后，家里人一起商量了一下，她和弟弟决定回来一起干。

“我们俩都不纠结，不管在城市还是回农村，有正事就行，而且我们都觉得农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余青青说，父母也很开明，尊重他们的意见。

余青青的父亲——57 岁的余正样，15 岁出门打工，在安庆、芜湖、南京等地拉过煤、卖过菜。对于家里好不容易培养的两个大学生回来种菜这件事，他觉得很正常。余正样说，孩子们学的专业虽然不是蔬菜种植，但经过大学的培养，眼界、思路都不一样，对蔬菜基地的发展很有帮助。

现在金铜蔬菜基地一共流转了 300 多亩地，建设了 230 多个蔬菜大棚，还有 40 多亩桃园和一些露天的菜地。

余青青和余永斌都已结婚，他们的另一半都有自己的事业。蔬菜基地主要由姐弟俩和他们的父母管理。在姐弟俩看来，如今，一家人在一起奋斗的生活很好，蔬菜基地也蒸蒸日上，当年决定回乡的这道选择题是做对了。

蔬菜需水量大，基地刚开始时全部靠人工灌溉，难免浇灌不均匀，菜苗成活率没有保障。在姐弟俩的坚持下，蔬菜基地开始进行智能化、自动化改造。枞阳县供电公司城郊中心供电所用电管员钱磊，见证了基地从人工到智能化的过程。“这个需要一次性做出比较大的投入，很多人舍不得，他们姐弟很有远见。”2019 年，蔬菜基地投入 30 多万元对农场进行电气智能化改造，升级智慧电气化大棚，添置了电滴灌、自动温控系统等，普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种了 7 年的蔬菜，最难“伺候”、最难种好的菜是什么？姐弟俩的答案让我很惊讶。“就是最常见的大白菜，越普通越难种好。”余永斌说，就像厨师，西红柿炒蛋很常见，但真正做到好吃还是要点真功夫。

采访结束时，我提议给姐弟俩拍张合影，他们把背景选在稍显单调的育秧大棚里，“每一棵菜都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余青青说。